



## 还原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民族精神

——评《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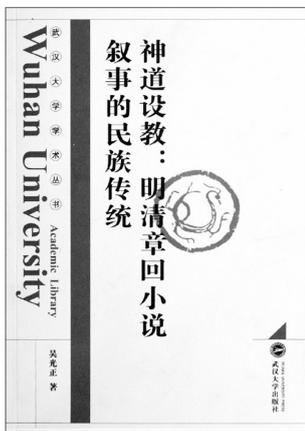
顾瑞雪

20 世纪以来,由于时代、政治等因素,学术研究也参与了百年来的文化建构乃至意识形态建构,这使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走上了一条“以现行意识形态解读作品”的途径;而大量套用外来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也成为百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的时髦路数。这种缺乏对古典小说作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明清章回小说(其中尤以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为代表)的误读,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因此,如何发掘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自身的民族传统,已成为当今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吴光正先生《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一著,正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本书的论述中,吴先生采取了“破”、“立”结合的方式。所“破”者,乃是 20 世纪以来的以现行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粗暴干扰文学研究、长期“搬运”或“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尴尬现状;所“立”者,乃着意于重建明清章回小说的阐释空间和个性空间,恢复明清章回小说创作意图的本来面目,从而凸显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建立符合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理论。因此,“叙事学”乃是吴先生所运用的方式,他真正的目的,在还原解读明清章回小说、复归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吴先生认为,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早已内化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创作时的一种下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恰恰表现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他们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驱遣于作家的笔端<sup>②</sup>。

本着这样的思想理路,论著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传统的分析和解读。吴先生着力于阐发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因为这对小说文本意蕴、人物形象甚至小说版本等诸多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论著首先分析了《西游记》。在典型理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认为“取真经全靠美猴王”、“真经就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上”,由此认定孙悟空为《西游记》的第一主人公。吴先生通过对《西游记》中宗教叙事的分析,指出孙悟空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则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双重意义;而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叙事者的三重身份又都从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在论著的第七章,吴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利用宗教叙事完成了情节架构、人物设计,确立了多元的叙事权威,传达刻骨铭心的生命意识的同时,“又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小说叙事中,用抒情文学的资源、笔法来写小说,为生命意识的传达创造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诗性叙事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的经典”<sup>③</sup>。正是这种对明清章回小说作者创作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对传统小说中宗教叙事的深入挖掘,使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欣赏并审视传统文学的新视角。

“生成语境”对分析小说文本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十分重要,它更能体现小说作品所代表



①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②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第 26 页。

③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第 288 页。

的文化属性。《金瓶梅词话》中的一些宗教描写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二重品格，比如永福寺道坚长老，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道坚被赋予了宗教圣徒的形象；而在结局部分，同样的道坚却被无情地加以丑化。相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于其他宗教人物形象身上。这种人物的宗教指向与世俗指向的内在冲突，源自于《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与口头叙事（即说唱文学）的密切联系。当《金瓶梅词话》的创作者试图运用宗教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创作意图时，曾赋予了宗教人物以超逸的品格；与此同时，创作者又继承了说唱文学的世俗品格与对宗教人物的批判态度，这导致了小说作品宗教描写的双重品格。《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历来就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一件聚讼纷纭的公案。从小说的生成语境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建立在传说、说唱、戏剧和历史文献等素材的基础上的，民间文学赋予了曹操“宁可我负尽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秉性。这一秉性将史传文学材料所展示出来的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光辉风采一扫而光。追究这一矛盾的形成原因，乃源于《三国演义》的写定者同时遵循着史传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文体规范：史传文学崇尚理性，注重历史评判，旨在“资治通鉴”；民间文学则崇尚偶像，注重道德评判，旨在“拍案惊奇”。这种不同取向甚至有时完全相悖的旨趣在《三国演义》中有清晰地呈现。也正是三国故事的写定者同时遵循了这两种叙事传统，才使作品中造成了历史必然性（三分天下与三国归晋）和道德倾向（“拥刘反曹”）二者的内在冲突。《水浒传》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章回小说，作者运用了儒家的政治神话与道教的谪遣神话两种叙事逻辑。按照政治神话的叙事，获得天书的宋江改邪归正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于国于家都应该是一个喜剧性的结局；而按照谪遣神话的叙事逻辑，天罡地煞最终是要回归神界，他们的降凡一者是为了报冤而开杀戒，一者则是为了历劫而受难，因此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必定要从悲剧中走向回归。道教的谪遣神话消解了儒家的政治神话，传达了民间社会的一种宿命情绪。吴先生通过对这些经典明清章回小说的宗教叙事分析，揭示了明清章回小说的生成语境和固有的文化属性，有力地驳斥了自20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动辄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切割与剪裁的荒谬与舛误。

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情节结构，胡适、鲁迅曾说《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好，矛盾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实在是糟得很”。这种评价大多是以西方叙事理论为标准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比照的结果。吴先生仍从分析宗教叙事入手，指出这种批评和贬低并不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在文人独创型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充分利用传统的儒家政治神话和道教降凡神话及其相关的宗教活动，完成了包括叙事框架、创作意图乃至情感诉求在内的艺术构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的情节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有力地驳斥了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糟得很”甚至没有结构的指责。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吴先生总结出中国章回小说叙事的五大传统，分别是：（1）“拍案惊奇”——口头叙事传统；（2）“资治通鉴”——史传叙事传统；（3）“直抒性灵”——诗性叙事传统；（4）“文以载道”——政教叙事传统；（5）“神道设教”——宗教叙事传统。这五大叙事传统又有机交融，相互穿插，形成了明清章回小说不同的面目和特色。

吴先生探究了明清章回小说作品的形成过程、版本演变和著作权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小说作品的形成过程和著作权为例。明代小说大都在整合讲唱文学、戏剧、神话传说或相关历史文献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相关整合者的生平资料又极为罕见，有的甚至根本无从考索，因此，在“时代—作家—作品”的思维定式下所形成的相当数量论断的科学性颇值得怀疑，有的甚至根本就是伪命题。吴先生尤其严厉地批判了“探佚学”、“索隐派”对《红楼梦》无中生有的妄自猜测和对后40回的粗暴指责，批判了阶级斗争论和个性解放论对《红楼梦》生搬硬套式的肢解与割裂，指出“大量的《红楼梦》论著反映的是阅读《红楼梦》的时代，而不是《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粗暴干预，使“《红楼梦》成为家族史的史料、社会史的史料、政治史的史料甚至是当代史的史料，而贾宝玉成了各种文化理念、政治理念的工具”<sup>①</sup>。这又与该论著边“破”边“立”的主旨追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理路。

吴光正先生别具慧眼地选取了宗教叙事传统这一明清章回小说的民族特点，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独到的审视和符合民族文学传统的贴切解读。这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古典小说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勤奋研究分不开<sup>②</sup>。“只有对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宗教叙事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超越现行文化知识结构的认知视野，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文本意蕴有同情之理解，发现被现行文化知识结构遮蔽的原始意义，达到对文本的还原解读”，这一观点，全文之中，三致意焉。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只有从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出发，进行符合于本民族文化的解读，才能真正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进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吴先生的这部论著无疑做出了成功的表率。

● 作者简介：顾瑞雪，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湖北 宜昌 443002。

● 责任编辑：何坤翁

<sup>①</sup>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第411页。

<sup>②</sup> 此前吴先生曾著有《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中华书局2006年）等论著，主编过多种宗教与文学方面的丛书。